

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

王毅杰 童星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383 migrants in Nanjing conducted in 2002, the thesis deals with some features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f the migrants.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size of the migrants' social support network is smaller, the density of it is higher, the homophily of it is stronger, the heterogeneity of it is weaker, and the strength of strong-ties of it is more prominent, comparing with that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villagers'.

一、引 论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出现了农民流动得以进行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形成一浪高于一浪的“民工潮”。而作为问题导向型的研究领域,在管理部门对流动农民完成从“限制”到“容忍”再到“整合”这一过渡的同时,学术界也从争论该不该限制他们流入城市,转移到描述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生活状况,探讨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结构性要素对社会结构的可能影响,而研究目的也从单纯的对策性研究转向结合有关理论进行探讨,主要有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冲突与失范、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网络等理论视角。

前三种研究视角都持地位结构观,都假定流动农民具有某些属性,并可根据这些属性对其进行分类,而其所属的类别决定着对其自身行动的解释;或者说这些视角都持个体主义立场,侧重从社会结构的层级关系出发,通过地位、身份、角色等概念来确定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以此来推断流动农民在这一社会制度安排下受到的限制与作用。与此不同的是,最后一种研究视角是一种网络地位观。社会网络是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即社会结构,从这一稳定体系来认识行动者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不是将其还原为行动者的内在属性和规范特征,进而补充或替代了主流的个体主义方法;它强调的是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而不是对某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巴里·韦尔曼,1994;肖鸿,1999)。

对于流动农民来说,告别熟悉的乡土社会来到陌生的城市社会,这一生活事件无疑意味着要疏远与生俱来的或漫漫岁月中所建构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开始在城市寻找梦想中的黄金或生活机会。而要获得这些黄金或机会,流动农民的人力资本并不处于优势,而其已有的和重新建构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或许可以弥补人力资本不足所带来的缺憾。“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华金·阿朗戈,2001)。

因而本文力图将流动农民置于从“农村人”向“城里人”转变的“过渡人”这一位置,通过与已有关于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研究结果比较,来探讨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结构。社会支持网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行动者从网络成员那里摄取资源,而不是个体自身拥有的资源,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并渡过危机,维持日常生活正常运行,这些网络成员即构成个体的社会支持网。

二、研究方法及相关指数

本文关注的是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那么社会支持有哪些类型?早期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关系存在,那么这种关系就一定能帮助个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以后一些研究才发现,社会支持并不具有统一的性质,不同类型的关系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

那么在研究中如何来获得社会支持网成员的名单呢？即采用何种提名法呢？马特·范德普尔 (Mart Ven der Poel, 1993) 认为, 提名法主要有 4 种: 互动法、角色关系法、情感法、交换法。其中交换法假定“拥有报酬性互动资源的人在影响被访者的态度和行为时是特别重要的”, 其优点在于特殊形式的互动是社会交往的实例, 因而适合描述个人社会网, 同时所有调查对象都可按照同样方式理解并给予回答, 但缺陷是排除了那些不是最近发生的有重要意义的互动关系。交换法已被多次使用, 其中以 1985 年罗纳德·伯特 (Ronald Burt) 设计、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采用的方法最为简明, 询问调查对象“在最近半年中与哪些人讨论过重要问题”, 这一提名法简单易操作, 但只能测量最为亲密的关系, 而且没有考察各种关系提供的不同帮助。1982 年费舍尔 (Claude Fischer) 进行的北加利福尼亚社区研究稍微复杂一些, 要求调查对象分别说明谁能提供 8 项帮助 (如看门、探讨工作事务、帮助做家务、社会活动、谈论嗜好、讨论烦恼、重要事商量、借钱), 他注意到了提供支持的不同关系类型, 但仍主要局限于重要关系。1968 年和 1978 年巴里·韦尔曼 (Barry Wellman) 对加拿大多伦多市东约克人进行了两次调查, 要求调查对象分别提供自己感到最亲密的、家庭之外的人, 那些有日常接触并在生活中具有重要性的人, 以及与其保持重要联系的人的名单, 然后回答在 15 种帮助中其向网络成员提供了哪几种, 又从每个网络成员那里接受了哪几种。他的这一调查方法同时注意到亲密和不太亲密的关系、支持性关系和非支持性关系对支持性关系的影响, 并对何种人提供何种帮助也进行了研究 (Danching Ruan, 1998; 贺寨平, 2001)。

范德普尔还将社会支持分为三大类型: 情感支持 (与配偶有矛盾时舒解、精神安慰、重大事项咨询)、实际支持 (家务劳动、患病时帮助、借钱、借生活日常用品、帮助填表) 和交往支持 (一同外出、拜访)。该分类涵盖了社会支持的各个方面, 便于对行动者的社会网络做全面了解, 因而被广泛使用, 1996—1997 年天津城乡居民调查 (张文宏等, 1999; 张文宏、阮丹青, 1999; Danching Ruan et al., 1997)、1998 年福建晋江农村居民调查 (张其仔, 1999)、2000 年贺寨平主持的山西农村老年人调查都部分地采用了此法。

因此笔者在范德普尔对社会支持分类和具体提名法的基础上, 根据流动农民实际情况, 采用以下问题作为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网络成员名单获得的方法:

1. 情感支持:

- (1) 当您心情不好, 想找人谈谈, 您会找谁来谈呢?
- (2) 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做出决定, 您找谁商量?

2. 工具支持:

- (3) 当您经济拮据或者投资需要一大笔钱, 您向谁借?
- (4) 当您在城市需要找工作时, 谁帮助您?
- (5) 当您在城里遇到麻烦, 如流氓骚扰、市容没收, 您会请谁来出面解决?

3. 交往支持:

- (6) 您和谁一起外出, 如逛商店、看电影、下饭馆、散步等?
- (7) 您和谁至少每个月交往一次, 如互相串门、聊天、喝茶、饮酒、打牌、打麻将等?

调查员向调查对象提出这些问题后, 回答多少人姓名就记多少, 并经过一次类似“还有吗”的追问; 然后询问每个问题中前 5 人的个体特征 (性别、年龄、户口状况、居住状况、职业、收入), 以及调查对象与这些网络成员的关系类型、交往时间长短、交往频率、关系密切程度。本次调查也涉及了社会支持网的网络密度, 采用 Fischer 的方法, 在调查对象所提到的所有人中抽取若干人, 要求调查对象说明他们相互之间是否认识, 若认识, 则说明他们之间关系是否密切。

有关提名法的另一争论是: 究竟是用姓名还是用关系来提名。有学者认为, 中国的调查对象把关系置于压倒性的地位, 会只回答关系类别, 而不提人名; 在调查对象看来, 处于同一关系类型中的人, 无论其姓甚名啥, 都没有什么差异; 并且范德普尔提名法的最终目的仍是通过提名追溯到关系, 有舍近求远之累, 因而关注关系类别要比关注人名更一目了然, 更便于操作 (张其仔, 1999; 张友琴, 2001)。然而笔者通过山西老年人调查与本次调查发现, 在中国, 虽然关系有着突出地位, 也的确有调查对象用关系来

提名的,但用关系提名多用于父母、配偶等专有或独一无二的关系,涉及配偶父母也用的是“他/她爸、他/她妈”,涉及辈份高的亲属用的是“大姑、二姨、三爷”,而对同辈和小辈则直接用姓名,更不用说对邻居、朋友、同事了,涉及雇主时有用姓加身份(如“张老板”)的方式。另外,在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对属于同一类关系中的人,调查对象无法以排序方式来表示他们的重要性,反而有调查对象提到“大姨”而一直没有提到“二姨”的现象,这是因为,其和二姨一家一直来往不多。同时,用关系提名的一个弊端是,当调查对象获得某一关系的支持,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该关系成员都给予支持,这种误解很容易引起网络特征及结构分析上的变形。

进行社会网络分析前,有必要交代网络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或指标(阮丹青、周路等,1990)。

第一,网络规模(size),是指构成一个个体社会网成员的数目。社会网规模也是测量个体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来说,一个流动农民如果拥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朋友,那么他往往会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实际帮助。一个网络成员只要提供支持,不管是哪一种或哪几种,都只能算是一个网络成员。应说明的是,若流动农民获得的某种社会支持源于组织(如公安机关、职业介绍所等),而并非某个具体的该组织的成员(如帮助他化解风险的张三是警察,帮助他找到工作的李四是职业介绍所人员),则不包含在社会支持网的有关计算中。

第二,紧密度或网络密度(density),是衡量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系程度的概念。紧密度可用关系密切的成员对数占有所有成员对数的百分比。如果一个社会网的所有成员都只与调查对象单线联系,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则该社会网的紧密度为零;如果该社会网的所在成员都相互维持密切关系的话,则其紧密程度为100%。对社会网规模大于1的调查对象,才进行其社会网紧密度分析。社会网的紧密度对人们态度的形成和行为的发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般来说,一个成员关系紧密的社会网不仅对个人的发展有很大帮助,而且对个人的行为也有较强的制约力。

第三,趋同性(homophily),指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在各个社会特征方面的相似性。行动者常常有更多机会或更倾向于与背景相近的人交往,例如相近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和居住地区等等,即多是群内交往而不是群外交往。通常用与调查对象在某个特征方面同属一个群体的成员占全体社会网成员的百分比,来表示趋同性。

第四,异质性(heterogeneity或diversity),指网络成员之间在社会特征及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其含义是,从某一社会网中随机抽取2人,这2人在某方面不属于同一群体的概率,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1 - \sum p_i^2$ 。

只有社会网规模大于1的调查对象,才计算该社会网的趋同性和异质性。二者是描述社会网特征的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都是描述网络差异的,趋同性是比较调查对象即核心人物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相同或相异,而异质性比较的是社会网成员之间在某社会特征或人口特征方面的差异。

在此,笔者将只计算性别、居住状况、职业的趋同性与异质性。网络成员的居住状况分居住在农村的农村户口、居住在农村的城市户口、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口、居住在城市的城市户口等四种。参照林南与边燕杰的分类(Nan Lin et al., 1991: 97),本文将调查对象及其网络成员的职业分为农民、建筑制造交通人员、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含办公室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他人员等七类。

第五,社会网络关系构成,指的是社会网成员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它通常用某一特定关系占总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例如,某调查对象提出了5名社会支持网成员,其中2人为其配偶和子女,另外3人分别为其同事、同学和朋友,那么其支持网的亲缘关系比例为40%,非亲缘关系比例为60%。在关系构成分析中,不包括社会支持网规模为零的调查对象。

关于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类型,笔者将其分为14种:父母及配偶的父母、配偶、子女及子女的配偶、兄弟姐妹及配偶的兄弟姐妹、其他亲属、朋友、邻居、老乡、同学、同事、老板、房东、熟人、因工作或生活接触到的其他人员(如银行职员、律师、记者、顾客、居委会等城市机构干部)。遵循边燕杰等(2001)对社会关系分类的做法,将前五种关系称为“亲属关系”,最后三种关系称为“相识关系”,其余称

为“朋友关系”；同时遵循汪和建(2003)的观点,将亲属关系称为“强关系”,将朋友关系称为“中间性关系”而不是边燕杰所称的“强关系”,将相识关系称为“弱关系”。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来自笔者于2002年暑期对南京市玄武区的红山街道、雨花区的赛虹桥街道进行的访谈式问卷调查。调查对象的选择,是根据南京市暂住人口登记资料及已有研究,从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构成、就业类型构成四个方面,进行非概率抽样中的配额抽样。发放问卷410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383份,有效回收率为93.4%。

三、研究发现

(一)网络规模

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即典型支持网的网络规模,是5.46人,42.8%的调查对象从6个及6个以上的人那里获得过某一支持或某几种支持,只有0.5%的调查对象(2人)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支持成员。

从社会支持类型来看流动农民网络规模:典型精神安慰网规模是1.7人;讨论网是1.64人;借钱网是1.53人;求职网是0.93人;处理麻烦网是0.68人;陪伴网是1.3人;交往网是1.43人。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精神支持中,83%流动农民的安慰网中有至少1个成员,89.6%的讨论网中有至少1个成员;在实际支持中,77.7%的可以从至少1个成员那里获得经济支持,61.7%的可从至少1人那里获得就业支持,46%的可从至少一个人那里获得解决麻烦的帮助。换句话说,17%的没有人可给予精神安慰;10.4%的没有人可参与讨论,22.3%的没有可借到钱的人,38.3%的没有人可提供就业支持,54%的没有人可出面解决麻烦。也就是说,与工具性支持相比,流动农民的精神支持方面的网络成员比较多。或者说,在笔者所调查的流动农民中,仍然缺乏能提供工具性支持的网络成员。

与已有研究相比:1986年天津城市居民讨论网规模为6.3人(阮丹青等,1990);1996年天津农村居民讨论网规模为3.478人,农村居民与市民的借钱网规模都为2.1人,精神安慰网规模都是2.6人(张文宏,1999a、1999b; Danching Ruan et al., 1997);而本研究的流动农民讨论网网络规模是1.64人,安慰网规模是1.7人,借钱网规模是1.53人。尽管因调查时间、地点的差异而不能严格进行比较,但相应数据均相差较大,因此可以说,流动农民这些具体支持类型的网络规模不仅小于农村居民,也小于城市居民。

(二)紧密度

在41.5%的流动农民整体网中,所有网络成员都是相互认识的,互不认识的平均百分比为25.11%;并且17.7%的所有网络成员关系密切,平均密切百分比为38.77%。

1986年的天津城市居民讨论网中41.4%的所有成员是相互认识的,互不相识的平均百分比是21.4%,12.8%的所有网络成员之间关系密切,平均密切百分比是38.0%。1996年天津农村居民讨论网中,在91.7%的讨论网中,所有成员相互认识,互不相识的平均百分比仅为2.5%;在51.2%的讨论网中,成员完全由关系密切的人组成,平均70.6%的成员关系是密切的。与这些研究相比,可大致看出,流动农民社会网紧密度低于农村居民而接近城市居民。

(三)趋同性与异质性

趋同性程度是由调查对象的群内选择比例来决定的。64.56%的社会支持网成员与调查对象是同一性别,与1986年天津城市居民讨论网(0.662)相差不大,高于1996年天津农村居民讨论网(0.575);62.91%的成员与调查对象一样都是居住在城市农村户口的流动农民;48.14%的成员与调查对象是同一职业,比1986年天津城市居民讨论网的(0.399)要高,而接近1996年天津农村居民讨论网(0.49)。可以说,流动农民的职业群内选择要高于城市居民,而接近农村居民。

异质性即复杂性,是一个社会支持网成员之间的相异程度,而不是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相异程度。典型网成员异质性指标都低于样本异质性,网络成员的性别异质性0.335小于样本的0.4744,是样本值的70.62%,16.9%的网络全是由同性组成的(即性别异质性为零),12.3%的网络是全部由异性组

成;网络成员的居住性质异质性为 0.3613, 23.2%的支持网全是由流动农民组成,没有任何调查对象的社会网全是由不同居住状况的成员组成(即没有调查对象的居住状况异质性为 1.00);网络成员的职业异质性 0.4619 小于样本该值的 0.6287, 16.5%的社会支持网是由同一职业组成,没有任何调查对象的社会网全是由不同职业的成员组成(即没有调查对象的职业异质性为 1.00)。网络成员职业异质性与样本职业异质性之比,和网络成员性别异质性与样本性别异质性之比例,相差不是太大(73.47% > 70.62%)。以上表明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的同质程度高于一般概率所预测的程度,这与 1986 年天津城市居民、1996 年天津农村居民调查相一致。

性别与居住状况的趋同性、异质性两个指标都相差不大;而职业的趋同性低于性别与居住状况,异质性却高于性别与居住状况,说明调查对象的职业群内选择低于性别与居住状况,而群外选择高于性别与居住状况。

与已有研究相比,性别异质性(0.335)与 1986 年天津城市居民(0.32)、1996 年天津农村居民(0.3)相差不大;职业异质性(0.4619)与 1986 年天津城市居民(0.48)差别不大,但高于 1996 年天津农村居民(0.319)。因此可以说,流动农民网络成员的职业差异高于农村居民,而接近城市居民。

(四)关系构成

在流动农民的社会整体网中,亲属占 49.9%(其中父母 11.3%、配偶 10.8%、子女 2.7%、兄弟姐妹 10.8%、其他亲属 14.2%),朋友占 46.1%(其中朋友 28.4%、老乡 7.7%、同学 1.4%、邻居 2.7%、同事 4%、老板 2%),相识占 4%(其中熟人 0.9%、房东 0.3%、其他 2.9%)。同时,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主要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作为强关系的“亲属”最可能参与流动农民生活中重要事情讨论、提供金钱的经济支持;作为中间性关系的“朋友”最可能提供精神安慰、外出陪伴、日常交往;作为弱关系的“相识”、中间性关系的“朋友”,比“亲属”更可能出面帮助解决麻烦。或者说,关系越强,越可能参与重要事情讨论和金钱支持;关系越弱,越可能提供精神安慰、出面解决麻烦、外出陪伴和日常交往;关系强弱与是否提供就业支持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亲属更可能提供对流动农民终身影响大、而同时风险也比较大或许承担责任也大的社会支持,而朋友更可能提供日常生活中风险不大也不需承担多大责任的社会支持。

从具体关系来看,父母更可能提供经济支持、重要事情讨论这些影响较大的支持,即使他们与流动农民自身并不在同一个城市;配偶参与精神安慰、重要事情讨论、外出陪伴;兄弟姐妹、其他亲属更可能提供经济支持和帮助寻求工作;朋友更可能提供精神安慰、外出陪伴和日常交往方面的支持;邻居、同事等面对面交往频率高的网络成员更可能提供外出陪伴和日常交往的支持;老板和因工作生活而接触的其他人更可能提供出面解决麻烦的支持。

接着来看不同社会支持类型的提供者。在参与重要事情讨论中,按比重依次为父母(30.4%)、配偶(28.8%)、朋友(14.4%)和兄弟姐妹(10.9%),强关系占有所有关系比重为 79.1%,而强关系中的强关系(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子女)占有所有关系的 72.2%。在 1986 年天津城市居民讨论网中,这一比重依次为同事(37.7%)、配偶(15.0%)、父母(7.4%),强关系占有所有关系比重为 38.9%。在 1996 年天津农村居民讨论网中依次为配偶(21.9%)、同事(16.2%)、朋友(14.3%)、邻居(11.7%)、兄弟姐妹(9.2%)、父母(7.6%),强关系占有所有关系比例为 55.4%。可看出,流动农民讨论网的关系构成中,强关系比例既高于农村居民又高于城市居民;同事和邻居力量急剧下降,而父母力量上升很快。原因可能在于流动农民流动过程中失去了家乡邻居的支持,而流入城市后的邻居乃至同事因生活中变动不居而产生陌生感或信任尚未形成,从而迫使他们依赖强关系中的强关系。

从借钱网来看,按比重依次为兄弟姐妹(26.0%)、其他亲属(22.3%)、朋友(22.0%)、父母(15.3%),强关系占有所有关系的 65.6%。1996 年天津农村居民该网络中,这一比重依次为兄弟姐妹(27.6%)、其他亲属(21.9%)、父母(14.3%)、朋友(11.8%),强关系占有所有关系的 67.7%;城市居民该网络中,这一比重依次为兄弟姐妹(21.3%)、其他亲属(17.2%)、同事(14.9%)、朋友(12%)、子女(10.6%)、父母(9.3%),强关系占有所有关系的 60.5%。可看出,在经济支持网中关系构成的强关系比例方面,流动农民

与农村居民相差不大,但略高于城市居民;朋友的力量高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父母的力量与农村居民相差不大,但高于城市居民。

从精神安慰网来看,比重依次为朋友(39.6%)、配偶(17.9%)、老乡(8.6%)、父母(8.1%)、兄弟姐妹(6.8%),强关系比例为41.2%。1996年天津农村居民该网中依次为:邻居(25.4%)、朋友(19.7%)、兄弟姐妹(12.9%)、同事(10.6%)、配偶(10.2%),强关系比重为42.6%;城市居民该网中依次为:同事(20.0%)、朋友(13.3%)、兄弟姐妹(13.1%)、配偶(11.8%),强关系比重为49.5%。可看出,在精神安慰网中关系构成的强关系比重,流动农民低于城市居民,但与农村居民相差不大;同时朋友与配偶的力量均高于城乡居民,邻居与同事的力量均低于城乡居民。

总的来看,在网络关系构成中强关系力量方面,流动农民更接近农村居民,而与城市居民差异较大;在具体关系方面,流动农民更依赖父母、配偶等血缘姻缘关系,基于兴趣、经历等而建立的朋友关系力量突出,而同事、邻居等交往频率较高的关系力量下降。

(五)各指标间关系

进行皮尔逊零阶相关分析发现,社会支持网规模越大,则紧密度降低,居住状况和职业趋同性降低,性别趋同性增高,异质性增高。其原因可能是,规模大,亲属比例降低,朋友和相识的网络成员增加,这使趋同性降低、异质性增加,而朋友和相识的网络成员通常是与调查对象同一性别。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中亲缘比重越大,紧密度相应越大,趋同性降低,异质性增高。如果不将亲属尤其是配偶、父母计算在内,则实际的各项指标的趋同性会更高而异质性会降低。而亲属在整体网络中占有最重要地位(49.4%),这就增加了网络成员各项指标的异质性,比如占有所有关系类型的10.8%的配偶必然是与流动农民本人性别相异的成员,流动农民的父母也大多居住在农村(72.2%)并从事农业活动(52.5%)。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在南京市务工经商的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分析,并与天津城市、农村居民的社会网比较,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规模不仅小于城市居民,也小于农村居民;紧密度低于农村居民,接近城市居民;网络的性别趋同性、异质性与城市居民相差不大;趋同性高于农村居民,异质性与农村居民相差不大,职业趋同性接近农村居民而高于城市居民,而异质性高于农村居民而接近城市居民。总的来说,流动农民的社会网络特点仍可概括为: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

第二,流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中,同样是居住在城市的持有农村户口的流动农民超过60%,因而尽管其社会生活场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血缘、地缘关系这些原有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李培林,1996)。这是因为对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流动农民来说,原有社会制度尤其是户口制度遗产所形成的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是“冷漠”或“漠视”,再加上分割式劳动力就业市场、居住格局,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网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建构新社会网络需要各种结构性接触机会(如职业、教育、日常生活等),才能有与对方建立相识、熟悉、交友关系的可能性。

第三,与农村居民的关系构成相比,流动农民的地缘(邻居、老乡)作用下降,亲属即强关系作用变化不大;而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构成相比,业缘力量不突出,亲属力量突出;朋友关系即中间性关系力量稍弱于亲属力量,并开始突出。

造成这一强关系突出的原因,有学者从亲属关系即意味着较强的责任、义务、信任等文化根源或中国社会仍然是伦理性社会来分析。但笔者认为,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相比,流动农民职业流动、地域流动较为频繁,他们平均去过2.13个地市级以上城市,有44.9%的人还在南京以外的城市工作过,并且有40%的人在南京换过工作,目前就业形式为雇工的在南京换工作次数平均为1.1次,自雇的平均为0.86次,雇主的平均为1.42次,并且对于自雇者和雇主来说,即使从事同一职业,也并不一定一直在同一地点进行经营。

正是如此较频繁的职业、地域流动,使得以前拥有的社会网络被迫放弃,而在居住的城市又难以形成固定的像城市居民基于单位制而结成的业缘关系,也难以形成像缺乏流动的农村居民所拥有的地缘关系,城市中的分割式居住格局又使其难与城市居民建立较为深厚的联系。或者说,原有的基于共同经历、情感与兴趣,可同甘共苦的“铁哥们”又为“稻粱谋”而多分散各地,在城里谋生过程中基于“生意”、或基于居住形成的邻居又不能算是“可交心的朋友”。因而他们对强关系的依赖并不是一种传统农民习惯,而是这一社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

另外,流动农民对强关系的依赖也可能与流动农民社会生活分化尤其是经济活动分化较弱有联系。目前就业形式(分雇工和非雇工两类)与网络成员中亲属数量呈正相关(0.029 显著水平上 Spearman 系数为 0.097),目前就业形式与支持网中有无配偶呈正相关(0.000 显著水平上系数为 0.411),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分化较弱的,有可能从事家庭经营活动,更倾向于向亲属尤其是配偶寻找支持。

应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将流动农民放在从农村人向城里人转变的过渡人的位置,对 2002 年南京市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与 1986 年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1996 年天津城乡居民社会网进行了比较,但各资料调查时间、地点存在差异,使得这一比较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今后可对某一地点的城市居民、流动农民、农村居民在同一时间点上进行调查和分析。

参考文献:

- 边燕杰、张文宏, 2001,《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曹子玮, 2003,《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贺寨平, 2001,《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第 1 期。
- 李汉林, 2001,《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载柯兰君等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央编译出版社。
- 李培林, 1996,《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彭庆恩, 1996,《关系资本和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阮丹青、周路等, 1990,《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探》,《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汪和建, 2003,《人际关系与制度的建构》,《社会理论学报》(香港)第 1 期。
- 肖鸿, 1999,《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袁亚愚, 1994,《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四川大学出版社。
- 张其仔, 1999,《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1999,《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张文宏、阮丹青, 1999,《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张友琴, 2001,《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华金·阿朗戈, 2001,《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 3 期。
- 巴里·韦尔曼, 1994,《网络分析:从方法和隐喻到理论和实质》,《国外社会学》第 4 期。
- Lin, Nan & Bian, Yanjie 1991, "Getting Ahead of Urban China"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Ruan, Danching & Linton Freeman et al. 1997, "On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 in Urban China." In *Social Networks*.
- Ruan, Danching 1998, "The Content of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iscussion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 Scott, John 2000,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Ltd.
- Ven der Poel, Mart 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 Wasserman, Stanley & Joseph Galaskiewicz 1994, *Advance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Wasserman, Stanley & Katherine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王毅杰系河海大学移民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
童星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责任编辑:罗琳